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朝堂之外： 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梁建国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朝堂之外： 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梁建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 梁建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7940 - 6

I. ①朝… II. ①梁…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D691.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44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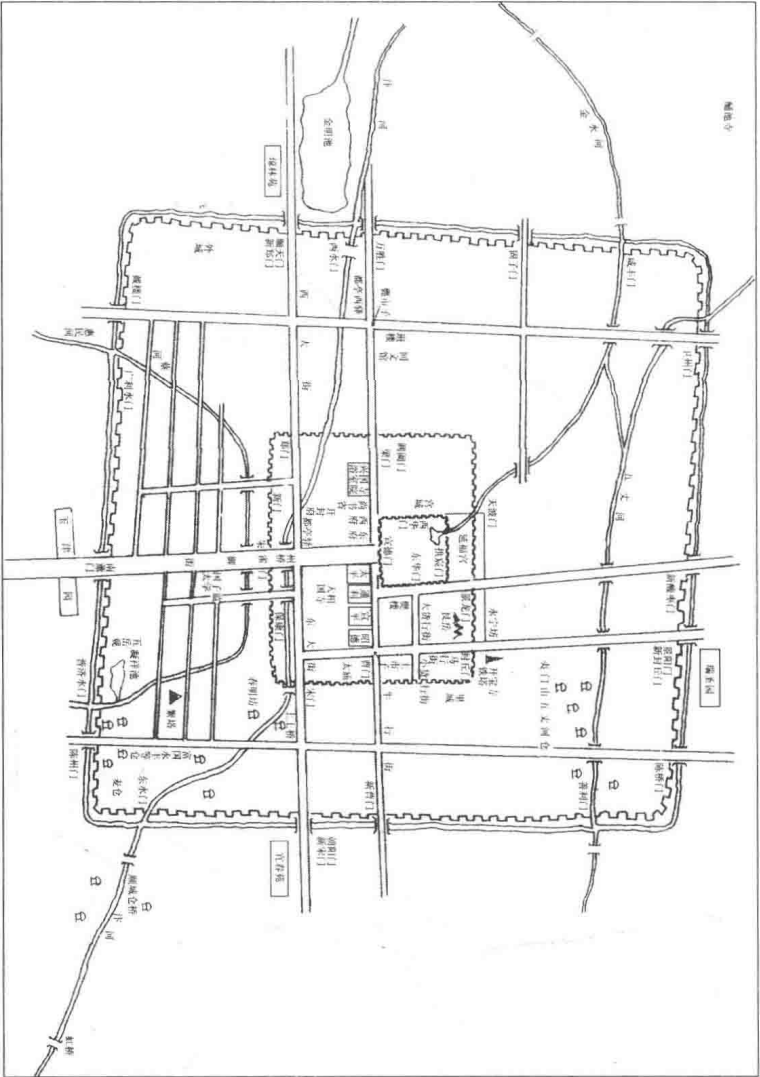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张艳萍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 125
插 页 2
字 数 351 千字
定 价 4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宋东京图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6)
一 北宋士人交游的研究	(6)
二 北宋东京的研究	(12)
三 其他相关研究	(19)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22)
第一章 拜谒	(27)
第一节 “崇饰纸笔以希称誉”——行卷与投贄	(29)
一 进士行卷,以求知己	(29)
二 投贄拜师,以博延誉	(42)
第二节 “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干谒与谒禁	(51)
一 干谒权贵,以求荐举	(52)
二 朝廷禁谒,舆论监督	(64)
本章小结	(70)
第二章 走访	(72)
第一节 “竹门容大马,金络照诸邻”——京城社会的融入	(73)
一 短暂驻留:漂若浮萍	(73)

二 友人互访:融入京城	(81)
第二节 “望君频访我,不必待书招”——休闲与 文学空间	(94)
一 休闲生活:放松身心	(95)
二 诗酒游从:文学创作	(102)
第三节 “高会良难得,危言岂易行”——士人走访与 党争	(109)
一 熙宁变法:恩怨纠葛	(110)
二 乌台诗案:交谊弥笃	(120)
本章小结	(131)
第三章 宴饮	(133)
第一节 “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 ——公共空间的宴饮	(135)
一 寺观园林:期集与游宴	(135)
二 馆阁衙署:谐睦与冲突	(144)
三 酒肆茶馆:礼法与商业	(150)
第二节 “华堂高宴卜良宵,宾客当筵半珥貂” ——士人宅第的宴饮	(156)
一 前提条件:有闲与有钱	(156)
二 会集方式:会饮与赐宴	(177)
三 文化活动:酬唱与歌舞	(193)
本章小结	(205)
第四章 雅集	(208)
第一节 “四方宾客坐华堂”——戚里之家的 奢华	(209)
一 西园雅集:艺术之真	(213)
二 宝绘堂考:富丽雅致	(220)

三 永宁坊考:贵戚云集	(226)
第二节 “观书已毕复观画”——书香门第的	
清雅	(233)
一 春明宋家:人文环境	(233)
二 收藏鉴赏:文化时尚	(243)
第三节 “冠盖城南忆高会”——功臣之后的	
余晖	(255)
一 王家宅园:诗酒赏花	(255)
二 京城雅集:风光不再	(262)
本章小结	(265)
第五章 送别	(266)
第一节 “祖离道旧之情备之矣”——日常性私人	
送别	(268)
一 士子返乡:或喜或悲	(268)
二 游宦外任:人情冷暖	(276)
第二节 “荣动中外,光震都国”——群体性公共	
送别	(287)
一 馆阁祖饯:他司所无	(287)
二 朝廷宴饯:朝野荣之	(295)
三 后生相送:空学出祖	(304)
本章小结	(309)
结语	(312)
附录:北宋东京宅园位置考	(322)
参考文献	(372)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云：

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①

这段话颇有层次地描绘了地方士人初到京城的心理体验。他们对于帝都气象的最直观印象是“天子宫阙之壮”、“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这些景观是地方州县所无法比拟的。随后拜会文坛领袖欧阳修，结识其众门生，切身感受到名公巨卿、贤士大夫们的雍容气度及其蕴藉的人文氛围。一座城市，不仅包括各种凝固的建筑，更离不开其中活动的人群。人际交往不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生存需要，也是城市文明

^① 《苏辙集·栾城集》卷22《上枢密韩太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

的核心要素之一。鉴于士人群体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丰富的相关史料，本书选择士人的交游作为探讨的主要对象。

多年来，学术界对于“士人”、“士大夫”等概念有过许多讨论，对此笔者不拟过多涉及。一般来说，士人是指古代社会的“书生”或“读书人”。在本书的特定背景下，我们把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与文化背景、参加过科举考试（“业进士”、“举进士”）或曾出仕做官（特别是文官）的这批人物皆归为士人。^①士大夫基本涵括士人的以上特征，但强调的是政治身份和政治等级，其基本要点是作为知识载体的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是士人和官僚相结合的产物。^②

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士人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赵宋朝廷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其权力结构是以广大的庶族士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③可以说，宋代为士人的主体意识高度觉醒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相当

① 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②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③ 参见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4页；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46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发达的时代，士人的活动无疑构成宋代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①

学界以往对于士人社会的研究，多是侧重于他们在朝堂之内的重大政治行为，毕竟这些内容会直接影响到朝政大纲、时代走势。一个时代的氛围之造就，虽然无法脱离朝堂这一核心，但东京士人的活动性质及整体社会气氛，则更多取决于朝堂之外的诸多因素，比如家世背景、文化教育、仕宦阅历以及情趣抱负，等等。士人的完整生存状态并不仅限于朝堂之内，士人在朝堂之外的活动空间更为广阔，活动内容更为丰富。交游即为士人在朝堂之外的重要活动。

学界以往在讨论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时，也曾注意到人际关系的因素对于朝堂事务的影响。不过，其研究依然是立足于朝堂之内，所关注的多是重大事件中所凸显的人际关系的客观结果，而对于此前这些关系如何生成的过程还少有研究。正如吾师邓小南先生所指出，在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叙

^① 近年来，关于士大夫是否为“精英”存在一些争议，可参见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本书认为，士大夫之所以被视为“社会精英”或“知识精英”，主要是缘于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和政治上的影响。他们经过科举考试的历练，在知识或文化上拥有超出普通民众的优势，既是知识的传播者、传承者，也是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创造者。北宋士大夫更是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他们通过参与各级政府的行政运作，在不同程度或层面上拥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和控制力，甚至左右朝廷的政局走势，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但是，作为知识或政治精英的士大夫并不一定是道德的楷模或正义的化身，他们身上存在着功利、享乐等人性的弱点。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汲汲于富贵，追逐着科举与仕宦的梦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追求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像范仲淹、王安石这样在道德和节操上也堪称“精英”的理想化的士大夫可谓凤毛麟角。

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经有意无意地筛漏掉许多活生生的行为，遗失了无数宝贵的历史信息^①。还有学者指出，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体和机构的动机，而处于长时段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似乎完全被忽略了。^②

近年来，有学者倡导历史研究的方式由过去的“事件史”转向“事件路径”，将关注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将事件定位为一种研究视角、切入点。^③实际上，历史乃绵延、持续的过程，重大事件并非历史的全部，其爆发往往是众多细小因素的日积月累，最终得以促成。具体到某一历史事件，其背后往往伴生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各种社会关系从生成、维系到发挥作用，正是通过看似平淡琐细的日常交游得以实现。

本书所讨论的“交游”即为一种广义上的人际关系之互动。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士人，他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士人社会的发展，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不断生成、积累与丰富的过程。士人的交游对象包括各种层次的社会群体，但本

①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7页。

② [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45页。

③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144—153+192页。一种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后一种的典范之作比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书主要着眼于士人与士人之间的交游，这其中既包括朋友之间的游从，亦包括与权贵的交结。学界以往对于宋代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关系多有考证和梳理，本书虽然也会对相关人物的交游关系进行考察，但并非着力于这些关系的全面考订，而主要关注的是具体时空内的士人活动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以及都市空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①与乡土社会有所不同，京城社会所活动的士人大部分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地域和出身背景。他们在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交游活动，建立起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实现着彼此的身份认同。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②士人的交游空间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基于特定的机缘，这些交游活动承载着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共同烘托、营造出当时士人社会的多彩氛围。

具体来说，本书主要关注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是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背景因素有着怎样的互动？

第二是士人的各种交游活动与不同类型的都市空间有着怎

^①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

^② 参见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样的关系?

第三是地方士人如何通过各种交游活动去融入京城社会?

总之,本书立足于朝堂之外,考察士人群体在东京开封的日常交游活动,联系这些活动所依存的政治、制度、文化等历史背景,探讨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同时关注士人活动与各种都市空间的互动,试图探讨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相关问题,以期对当时京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士人社会的诸多现象获得更为丰富、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基于本书所讨论的对象,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北宋士人交游与北宋东京这两个方面。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为本书提供各方面的借鉴和启发,同样构成本课题的学术史背景。

一 北宋士人交游的研究

对于宋代士人交游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代表性的论文当属邓广铭先生早年的《辛稼轩交游考》。^①此后,这类以某个士人为中心的交游考述性文章,数量相当可观,一些重要人物的交游都有涉及。还有一些成果是着眼于某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对相关人物的交游状况也有论述,代表性的如王水照先生对北宋洛阳文人

^① 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原载《复旦学报》复刊第1期,1944年10月;后收入《邓广铭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557页。

集团和苏门群体的研究。^①

20世纪末，学界在研究宋代家族史的同时，也关注到士人及其家族的交游问题。^②正如吾师邓小南先生指出：“对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之研究亦有丰硕的成果，选题则大多集中于政治制度、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方面。相对而言，对于宋代士人之间以及士人家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一环。”^③《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和《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这两篇论文，即从这一研究视角入手，对宋代地方士人家族的交游研究进行有益尝试，开辟了宋代士人及家族研究的新视野，堪称研究地方士人及士人家族之间社会关系的力作。^④再如黄宽重先生对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邹重华先生对宋代四川地区士人的学术

①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原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后收入《王水照自选集》，第131—152页；马东瑶：《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2004年；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② 关于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可参见郭恩秀《八〇年代以来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新史学》16卷第1期，2005年3月，第125—158页。

③ 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3页。

④ 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兼谈南宋前期昆山士人家族的交游与沉浮》，《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81—109页；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486页。

交游圈进行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①综括来看,目前的成果大都集中于地方性士人家族,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相互呼应,而以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东京作为活动背景来论述的还不多。

关于士人群体的集体活动,学界从诗社、文会、集会、雅集、宴饮等角度做过一系列研究^②,也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因而颇有参考价值。关于宋代士人日常生活、礼节、风俗等的论著也构成了士人交游的研究基础。^③

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对于士人交游也有涉及。比如,刘子健先生在回应、补充宫崎市定先生对于宋代士风的看法时,讨论庆历变法引起政潮时士大夫间的交游和摩擦、明争之外的暗斗。^④何冠环、罗家祥、沈松勤、萧庆伟以及余英时等

① 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1999年,第627—669页;邹重华:《士人学术交游圈: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另类视角(以宋代四川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第9期;后收入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456页。

②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欧阳光:《宋代的怡老诗社》,《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史江:《宋代会社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③ 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八章,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第197—222页。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229页;方健:《宋代的相见、待客与交游风俗》,《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123—128页。

④ 刘子健:《梅尧臣〈碧云暇〉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03—116页;宫崎市定:《宋代的士风》,《史学杂志》,1953年,第62编,2号,第46—67页。

学者也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北宋党争进行过讨论。^① 平田茂树先生指出，以“同”为核心的同乡、同年等关系网络构成宋代朋党形成的契机。^② 士人的某些交游活动还受到朝廷的限制，关于官员的谒禁制度也有一些研究。^③ 这些成果在不同的层面上涉及士人交游的问题，对本书的研究多有助益。可以说，北宋的党争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多是立足于朝堂来讨论与政治相关的问题，其所注意到的也多是重大政治事件中凸显的人际关系的结果。本书则变换研究的视角，立足于朝堂之外来考察士人交游在政治风云变幻下所呈现出的万千气象。

北宋士人一般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东京开封又是北宋科举考试的考场所在地，因而科举制度与本书关系非常密切，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可参见何忠礼先生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④ 具体而言，祝尚书先生讨论科举制度下的宋代士人在东京的活动，比如进士行卷与文学、登第进士

① 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 平田茂树：《宋代朋党形成的契機について》，《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3—46页。

③ 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5页。

④ 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42—155页。

的恩例与庆典以及“科名前定”的社会心态等等。^① 山口智哉先生认为同年关系通过《同年小录》这一载体得以强化，并对日后的官场关系网产生影响。^② 宋代进士及第者虽然较唐代大为增多，但比例依然不高，更多的士子徘徊于举子的阶段。^③ 王鹏先生对宋代落第士人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进行了探讨。^④ 黄云鹤先生探讨唐宋落第士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指出宋朝落第士人中，还想继续科举者不再像唐代那样去结交上层官宦，而将社交注意力转移到文化名人和名师身上。^⑤ 贾志扬、赵冬梅与程民生等先生先后论及宋代开封解额较其他地方为多，籍贯开封的进士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⑥。

学界在研究宋代城市文化时，对于士大夫群体也有涉及。包伟民先生认为，由于士大夫阶层拥有政治核心资源等原因，一如既往地掌握着文化的霸权，从两宋时期起，社会文化的中

①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383页；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18—383页。

② 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录〉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17，2002年。

③ 李弘祺：《宋代的举人》，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年版，第297—312页。该文所称的举人与举子意思大同小异。

④ 王鹏：《宋代落第士人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⑤ 黄云鹤：《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⑥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赵冬梅：《北宋科举解额初探》，《北大史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35页；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2002年第6期，第108—113页。